

红色印记

鲁迅与云南籍共产党员(下)

郑千山

鲁迅生前,与少数民族朋友有过许多交往,比如与两位回族朋友伍仲文、王仲猷朋友就有过10余年的深厚交往。他还关心、交往、扶持和影响过李辉英、端木蕻良、马子华、萧乾、金丁、李乔、陆晶清和陆万美等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其中不少就是共产党员,其中,曾任北平左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的陆万美就是其中之一。

陆万美(1910—1983),白族,曾用名笔名陆绿曦、陆陆,云南昆明人。中共党员。云南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早年就受马列主义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在云南和国内进步报刊上发表诗文和译作,揭露旧世界的黑暗,热烈地表达了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理想,在这段时间里,和艾思奇、聂耳等革命青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27年后,他历任云南《民众日报》副刊特约撰稿员,北平《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编辑,北平左联常委、出版部长,苏中四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南通县科长,山东第11师政治部副主任,山东军区文工团、新四军文工团团长,山东大学文艺系主任、文工团书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科长,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1949年后任云南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政协云南省委常委。192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杂院里的故事》《刘先生的皮鞋》《战士行》,剧本《我们走遍祖国》,回忆录《隽永的忆念》等。

陆万美与鲁迅总共见过3次面(不包括听演讲),都是在1932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省亲的15天当中。鲁迅1932年10月13日抵达北京(当时还叫北平),除了探望母亲以及在北平的妻子朱安之外,顺应当时的形势和大众的需求,在北平左联的安排下,在北平北大二院、辅仁大学、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和北师大一共做了五次公开演讲,即著名的“北平五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感想》《进学文学与革命文学》等,这些要代表北平左联的安排并以学校行政或学生会名义邀请鲁迅,陆万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鲁迅,并聆听了鲁迅的演讲、谈话与教诲。

对于鲁迅的演讲,陆万美很有感触,他后来记录下来:“演讲的主要内容,记得主要有二:一、是在打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侵略者的投降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奴才政策以及残害人民的血腥屠杀,荒淫无耻的卑鄙行径,同时也尖锐地揭发了一些御用学者的欺骗言论:什么相信‘国际联盟必会出面公正处理’,什么‘读书救国’等等,实际都在骗惑人民走向幻想的歧途,以削弱爱国主义斗争的力量。因而,先生对于整个民族垂危的形势,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加上先生自己敏锐的观察,生动地予以发挥,对



各种各样的听众,都发生了深深刺痛人心的警觉作用。先生并进而鼓励人民:热爱祖国,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严重形势,同时还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认真地、实际地’准备和进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二、是在文艺战线上,针对着当时北京的‘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亡国倾向,揭露他们口口声声‘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质,实际是在‘帮忙、帮闲’,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对于所谓‘民族文艺’的阴谋意图和卑鄙活动,也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同时,还公开地一一在当时,旁人从不敢公开谈起,因为这可能引起被捕、杀头的危险——谈到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如何在严重的迫害下坚持斗争的情形,先生充满无限信心地解说:普罗文学运动,是生根于中国社会最有前途的工人阶级,又和广大人民有着密切联系,任何的屠杀迫害,都不可能把它摧残下去。几次演讲中又都涉及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的自我改造问题。这几次的演讲,对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迫近榆关,锐利的刺刀尖已冰冷地刺在胸口的华北人民来说,确实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很多中间的和落后的人们,从此都有所惊醒和转变。对当时的‘北平左联’,也明确了方向,开始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紧接着展开了一个紧张活泼的新的斗争期。”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1月24日在北平范文澜家中,见面以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为鲁迅先生举办洗尘宴会的形式进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为“同席共八人”,这当中就包括了范文澜、陆万美、张磐石、刘惠之等,那天下午,鲁迅还在平大女子文理学院演讲,到“天渐昏暗”,鲁迅才来到,陆万美记得:“棉布门帘一掀,先生很矫健轻捷地走进来了。多年来崇拜的,从形象到精神都很熟悉的伟大先驱者,很亲近地站在我们面前了,但身材比想象中要矮点。先生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很快脱



青年陆万美

去了陈旧的青灰色粗呢大帽,里面是一身黑芝麻花布的薄棉袍。虽在冬天,仍穿着胶底布鞋。这天,先生曾忙了一整天,刚刚又做了演讲,但一点儿也不显出老年人的疲惫和衰弱,却是精神充沛,很像一个青年战士……这晚,先生谈话最多,一边慢慢喝着绍兴黄酒,品味着鱼虾蛤蚌之类的鲜海味(这是特为先生预备的江浙酒席),一边以低沉的声音,亲切地谈笑着。记忆中,谈了许多上海左联的情况,怎样坚持斗争,内部反关门主义的问题,‘一·二八’后上海工厂主义活动和“工农兵通讯”活动情况。鲁迅先生更非常关心北平学生运动和文艺界的情况。我们谈了一些,先生冷静地又极有兴趣地倾听着,并不时对学生南下示威的爱国行动所给予国民党的打击,异常满意地放声笑了,就便也插入一两句对南京反动统治狼狽相的讽刺,引得大家也痛快地笑起来。听到北平‘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情形,先生愤愤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艺术的堕落倾向,并且提议:‘在北平,我们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在北平,我们应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在北平,我们应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在北平,我们应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北平各左翼团体对鲁迅的欢迎会上,也是一个晚上,在北海旁,参加的还有陈沂、于伶、潘训、宋之的、李昭野等。陆万美回忆:“这次是正式开会的。各文化团体依次汇报了工作情况。鲁迅先生特别着重了解左联的,他自己后来发言也着重提文艺斗争这方面,他得意地说,首先提到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主张仍然应该用笔才是主要的战

斗方式(当时因受机会主义的影响,工作中确有一种简单化的偏向:党、团、群众团体,几乎毫无区别,一律‘散传单,写口号,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左联的人反倒也不写文章了)。同时,他也谈到反关门主义问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改造问题。他主张作家要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要尽可能深入工农,面向生产,获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体验。他反对许多人把工人写成流氓的形象,一开口就粗鲁地骂几句‘他妈的’,好像就成了无产阶级。记得他……也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表现做了简明的解释。另外还提到:组织上要他写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胜利战斗的长篇小说,材料也搜集给了他,他自己最初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重要的任务,极愿意努力写出来。但经一再研究考虑,仍然不敢下笔,因为究竟只有文字上的材料,本身对那样的斗争生活是不熟悉的,怕不能充分写好这一伟大斗争,甚至写歪曲了。记得也谈到:他计划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以至‘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发展的长篇小说,并说:‘主要还是要提出:纠正关门主义,如何对某些要求进步的作作风严肃正派的老作家进行团结工作,如何注意发现及培养新的力量等。最后,还是强调‘要好好办一个刊物’。”

几天后,出于对鲁迅“纠正过去关门主义倾向”意见的尊重和落实,“北平左联”在北海五龙亭举行了一场茶会,除“北平左联”同仁外,还邀请了郑振铎、朱自清等先生出席并且毫无隔阂地个别交换了许多开展文艺工作的意见。陆万美也因此第三次见到了鲁迅。陆万美说“这样公开的活动,在过去的左联从没有过”。第三次见面推动了“北平左联”以“北平西北书店”名义所编刊的《文学杂志》的诞生,在能克服国统区的前辈和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下,刊物编印出版了,鲁迅返回上海后也立即为刊物写稿并发表在创刊号上。陆万美说:“刊物出版后,他更为高兴,不断写信来具体指导和告给我们上海文艺界的一些重要情况,并不断寄给一些他所编印的新书刊。正由于得到先生经常的热诚关怀、许多文艺界同志的支持,刊物才能克服国民党特务所给予的各种各样阻碍和困难,坚持办下去。每次编辑会议,常常是通夜不眠的,大家仍感到非常愉快……”

通过与陆万美的交往的“一斑”里,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鲁迅,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工作的,这也是晚年鲁迅为“革命”工作的令人难忘的美丽图像。

云岭阅读

体味一位学者的学术跋涉之路

——《张文勋学术谱录》读后

赵佳佳

张文勋先生是云南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文心雕龙》学术泰斗。云大中文学科的师生,无不受先生的沾溉,可先生却说,自己只是学术道路上“一个永远未到达理想彼岸的跋涉者”。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文勋学术谱录》(2021年1月版)一书,记载了先生从上个世纪初跋涉而来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先生留在身后的那串“弯弯曲曲、断断续续的脚印”,正是令后生心向往之的治学之道、处世之风。读罢全书,感触良多。

1987年9月,先生小女儿张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先生感到十分欣慰与高兴,作诗《与鹏儿书斋合影》云:“斗室虽云小,胸中别有天。神驰三界外,笔走万年前。学海知深浅,书山识后先。青蓝相间出,翰苑谱新篇。”其中“斗室虽云小,胸中别有天。神驰三界外,笔走万年前”两联,正是先生书斋生活的真实写照。

书斋虽然不大,但书斋中人却有囊括宇宙的胸怀;先生虽身处西南一隅,但治学的眼光却不可谓不卓尔独到。在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纯文艺理论”时,先生提出并全面深入地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文艺理论”这一观点,带给中国古史文论研究的是从无到有的转变;在中国美学研究方面,先生将其放置在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发展背景中,全面论证了中国美学的特征在于儒释道三家美学思想的融合;在《白族文学史》《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序》等著述中,先生一再指出,名副其实“中国文学史”,理所应当包含我国56个民族的文学,如此才能反映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这些观点的提出让我们看到先生治学的开阔视野和广阔胸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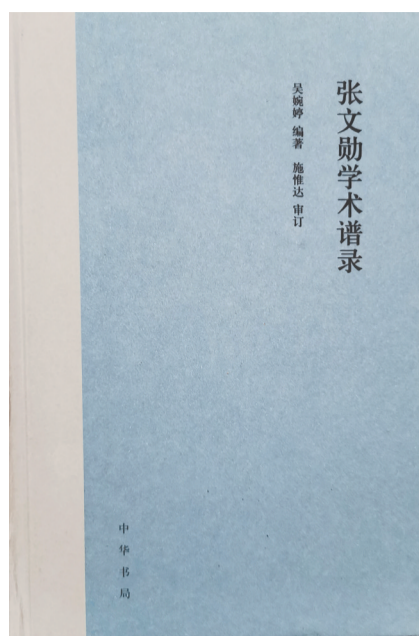
先生既以高屋建瓴之势观照文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又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葆有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常用“斗室雕虫”来形容自己的书斋生活,在自谦的含义之外,也让人读出先生对待治学的那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沉潜。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除上午去上课外,全部时间在家读《诗经》,也仅只读了《云汉》等两篇而已。进度甚慢,但贪快是不行的,还是踏实些好。事情就是这样,往往是想的少,做起来就不是那么便当,读书也是如此,故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能眼高手低。是为戒!”

在“翻眼的成果背后,先生付出的全是独自书斋的寂寞与埋头苦读的辛勤,那一部部的巨著就在这一点点的钻研中打磨出来的。如今再回顾‘斗室雕虫’的字眼,先生埋头钻研的情形似乎就在眼前,一位学者的背影愈发孤峭挺拔。

数十年间,先生担负着教学和行政两头重担,同时还要照顾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可就是在这样的多重高压下先生仍然笔耕不辍,每年都贡献诸多重要成果。我一直不解先生是如何抽出这么多时间进行学术研究的,并且在一次采访中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先生笑着说:“其实很简单,别人工作的时候我也在工作,别人睡下的时间就是我做自己的研究的时候。”

先生说,从前住在云大西苑,38平米的小套间里,灯常常亮到夜半。我不曾有幸见过那盏灯光,可我知道,先生的治学品格早已是一盏明灯。

1997年,先生访问台湾,写下长诗《游台湾海峡合韵越合欢山百句韵》,全诗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其中有“人生曲折路,心静自然怡”之句。先生曾说自己是跋涉者,当他在人生的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时,秉持的正是这种“心静自然怡”的平和与不争。先生对治学一丝不苟,常常发出与学界主流不同的声音,可在生活中,他



却从不争。先生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人生不可能永居高潮,高潮是暂时的,重要的是日常平静的生活,过好普通人的生活,保持平静而愉悦的心态,淡泊些,再淡泊些。”面对外界的赞誉,他总能保持一颗平常心。1993年教师节之际,云南大学和中文系为先生举办了“张文勋先生从教40周年座谈会”,各界人士纷纷出席,对先生表示祝贺。面对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先生既感动也感到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应当默默无闻地多做些实际工作,尽可能避免这类出头露面的活动,物极必反,古有良训。我年近古稀,荣誉声名,更应淡薄了。”先生就是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洗尽了世俗的浮华,悠然于天地山川草木之间,不著于物,而愈自高洁。

先生淡泊,却不冷漠,他对自己毕生的教育事业充满赤子深情。云南大学文学院张国庆教授是先生高足,他曾在《闪光的师魂》一文中回忆起自己与先生相处的点滴。1984年初春,昆明骤降大雪,恰巧那日下午有先生的课,往往是先生的张老师那几日正感冒发热,猜想如此天气先生未必会去讲课,便生出畏寒畏难之意,可是又想万一先生去了自己没去就太难堪了,经过反复斗争,张老师还是裹上了厚重的大衣艰难前行。进了学校,人影稀疏。转过一个弯,一抬眼,张老师却像往年近花甲的先生已经站在教室外的台阶上了,还笑着跟张老师打招呼:“病好了吗?大冷的天,没好就不必来了嘛。”张老师说,从那时起,先生仁立风雪等候学生们上课的情景便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2009年先生荣获云南省第二届“兴滇人才奖”,奖金30万元。当时的30万不是一笔小数目,可先生毅然捐出所有奖金,在云南大学成立“张文勋助学金”,以奖励后进。先生说:“我认为只有这样,这笔钱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先生经历过太多的曲折和坎坷,可他从未抱怨,总是在无怨无悔地默默背负着、奉献着,以他“暨黄昏时分不动情”的淡泊走过泥泞与坑洼,又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回馈着每一寸土地。

先生是大理洱源人,干坝头的洱海水域从这里发源,每一个饮洱水长大的白子白女都受到洱源这片土地的恩泽。先生的治学之道与处世之风,又何尝不是云大中文精神的无尽水源?我何其幸运,能捧读这本《谱录》,真切感受先生跋涉的足迹,并从先生的精神中得到无尽的沾溉与滋养。

阅读笔记

《红色家规》:修身齐家的精神蓝本

程应峰

家规是什么?是指一个家庭的行为规范,通常是一个家族传承下来的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准则,也叫家训。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修身齐家和治国的关系,很清楚地意识到,要建成一个祥和安定的社会,需要有胸怀大志、品学兼优、正直明理的人。所以,他们把教育子女当作人父母的重任,养子必教。他们注重立志教育,着力于教育子女树立远大志向,做一个正直的人;也注重俭朴、廉洁教育,要求子女勤俭为本,爱惜一布一饭,让他们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自古至今,养子不教,不仅危害自身,也危害他人,更危害国家。

我们平常所说的家风,就是遵循家规而形成的家庭风气,包括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行为准则、价值准则。家风是一种家族文化风格,它凸显的是家族成员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 and 整体气质。

红色家规涵育出的是红色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家庭文明、传统习惯、行为准则及处世之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道德、价值取向及作风在家庭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王纪一所著《红色家规》(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1月版)一书,对当前的家庭教育及家风建设颇具启示价值。它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董必武、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

家教建设,进行有温度的叙述。全书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忠诚老实、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甘于奉献、严守纪律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治国必先齐家,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国家的功臣,也是治家的典范,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身居高位,保持本色。对子女,从严教育,育德育才;对妻子,相濡以沫,共同进步;对亲友,公私分明,坚持原则。他们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的传家立德力行之举,堪称修身齐家的精神蓝本。

毛泽东的“四不”:不介绍,不推荐,不送礼,不写信。体现了一代伟人的行为自觉,更彰显一代伟人磊落坦荡的胸襟。他对亲属家人如此,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期望子女自食其力,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之时,毛泽东以父亲的身份招待了儿子一餐,随后,便要他去食堂吃大灶。接下来,又要求他去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并去信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者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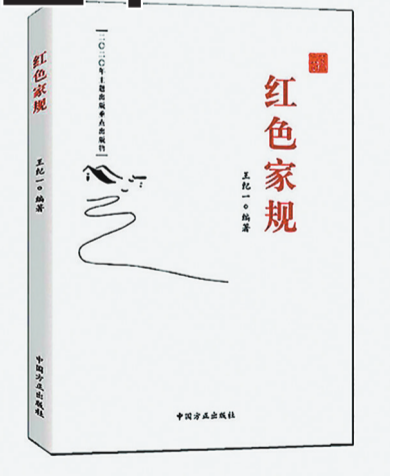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只能出差路过时看看;来者一律住招待所;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

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去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从日常生活着眼,对家人提出了严格要求,公私分明,用心良苦。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以治家的风范。

刘少奇给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学会自己洗衣服,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立出门。他对最小的儿子刘源十分疼爱,但并没有降低要求。相反,他有意让儿子到艰苦的生活中去锻炼。比如刘源的中学时期,每年暑假都在部队接受严格训练,每天和战士们一样托着砖头练射击,顶着烈日练刺杀,常常是汗水水泥水一身。巨大的训练强度,让刘源感到有些吃不消,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刘少奇鼓励他,要克服困难,毫不松懈地继续训练。

读《红色家规》,读出的是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子女,对亲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严格要求、严格要求的一个个鲜活生动、深入灵魂的故事,对当前党员领导干部的家庭家教建设,无疑具有强大的导向指引作用。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物化的东西可以改变,但共产党人的初心始终没有变过。可以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规,永远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精神蓝本,需要我们自觉地在传承和弘扬,并且在身体力行中加以发扬光大。



《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革命》出版

2021年重点出版物《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革命》,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该书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魏柳南撰写,书中翔实介绍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经验,是一本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通俗读物。通过大量故事和案例,客观记述人民生活、教育发展、社会保障、脱贫攻坚、人民健康、社会治理等方面情况,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郑千山

娜嬛插珍

吟诗赏月过中秋

钱俊男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中春,春,击土鼓吹豳雅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云。”欧阳修的《长安玩月诗序》载:“秋云于时,后夏先气;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于天。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蜍圆,故曰中秋。”

关于咏月,历史不乏许多千古不朽的篇章。唐代诗人李白就有脍炙人口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照古人时。“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离。”不向东家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的杰作;杜甫也写下了“青天沙漏薄,明月去清波。”“砍却月中桂,青光应更多。”“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的佳句;戎昱的“秋月月色胜春宵,万里霜天静寂寥”,岑参的“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王建的“月似圆盛色新凝,玉盆盛水欲侵侵。夜深尽放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皎皎秋月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一年无似如今夜,十二峰前看不足”等诗句,也意境深远,情真意切,词丽韵清,感人至深。

但中秋咏月诗里最为有名的当数苏轼东坡的《水调歌头》一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全词字字珠玑,举杯问月,风流豪放,胡适曾评道:“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出,余词

尽废。”可以说,这是历代中秋诗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

南宋时,民间中秋赏月吟诗之风更加兴盛,大词人辛弃疾的中秋词《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最为有名:“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兔,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听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虚实中实,慷慨激昂,神来之笔,令人叹为观止。

中秋之夜,明月高悬,银辉洒地,一切显得是那么的美好。文人墨客们说:“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最是中秋。”明代诗人边贡写道:“月宫秋冷桂团团,岁岁花开只是攀。共在人间说一轮,不知天上忆人间。”然而,有人面对一轮皓月,抒发的情感却因人、因地、因时而不同。举头望月,有人看到的却是无限的愁绪。这类作品中,晚清两位诗人的借月抒怀之作,尤其动人。樊增祥《中秋夜无月》写道:“亘古清光彻九州,只因烟雾锁琼楼。莫愁遮断山河影,照出山河更发愁。”诗人对祖国的危局早已怀着深沉的忧愤,如今又逢中秋夜天阴无月,更是缘境生情,遂从反面立意,抒发对山河破碎的愁思和感慨。鉴湖女侠秋瑾的中秋词《满江红》写道:“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独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夫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全词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基调雄健高昂,感情热烈奔放,一代巾帼英雄形象跃然纸上。